

# 论孔子诗学的文化转向

陈 绪 平

(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, 成都 610066)

**摘要:**孔子开启了“以义言诗”的时代。自孔子起,诗的性质、传承方式等都发生了变化,深刻地影响了后世诗学的发展。孔子实现了《诗》到《诗经》的转变,早期文献中的“子曰诗云”便揭示了孔子诗学文化转向的意义。

**关键词:**孔子;诗学;文化转向;“子曰诗云”

**中图分类号:**I206.2 **文献标志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0-5315(2013)05-0107-04

审视先秦学术,孔子无疑是这段学术史演进中的重要一环。在他的所有文化贡献中,他的诗学评论,无疑是最值得注意的。原因在于孔子与《诗》都是先秦学术史上最为关键的符号,并深刻地根植于之后的传统学术之中。孔子诗学内容包括文献整理和诗论两部分。学界的讨论多集中在:围绕孔子与六经,讨论孔子删《诗》问题,这个问题可谓历来争讼不已<sup>①</sup>;随着上海博物馆藏《孔子诗论》的出版,学术界开始重新认识孔子的诗学,这样的研究多集中在讨论孔子的诗教与诗学;还有就是从文论研究的角度出发,研究孔子的文艺学思想,等等。然而,还有一个大问题,即作为早期技艺之学的“六艺”如何在汉代最终形成了作为义理之学的“六经”,在这个转变中孔子及孔门的文化遗产的作用如何,值得深入研究。本文拟从这个角度做点尝试性研究,以请教于方家。

## 一 孔子之前的诗学

孔子之前的诗学评论的材料比较少,最为经典的要算《尚书》关于“诗言志”和《左传》所载的吴公子季札观乐时的评论。《尚书·舜典》曰:“夔,命汝典乐,教胄子,直而温,宽而栗,刚而无虐,简而无傲。诗言志,歌永言,声依永,律和声。八音克谐,无相夺伦,神人以和。”<sup>[1]131</sup>这里的“诗”、“歌”、“声”、“律”处在同一逻辑平面之上。这里的“诗”,据王小盾师的研究可知是代

表了早期礼乐歌舞活动中的“吟诵”的传统<sup>[2-4]</sup>。这段话总体上是针对早期音乐活动的议论,主要是针对诗的仪式功用层面提出的要求,强调诗乐的核心功用是达到“神人以和”的境界,这是对“娱神”为目的的仪式音乐的审美诉求。这里的诗,是作为礼乐系统的一部分而存在的。仪式性、礼仪化是这个时代《诗》学评论的核心内涵,且其评论是针对音乐在内的礼乐活动而作出的。

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记载的吴公子季札来鲁观周乐的史料,更是受到文史、艺术诸领域的研究者的广泛关注。因为作为先秦重要文献,它至少说明了以下诸问题:(一)这次季札观乐听到的音乐,涵盖了今本《诗经》的大部分内容,是《诗》文本结集研究的重要材料;(二)作为来自吴国的人,季札对《诗》有如此精湛的批评,可见《诗》早已远播南方吴地,季札对其深有研习;(三)分析季札评论的角度,我们发现这里的《诗》评论还是对音乐的评论,与前面《尚书》娱神的仪式音乐的评论不同,这里的评论建立了“音乐”与“政治”的关联。比如为之歌《郑》,季札评论曰:“美哉!其细已甚,民弗堪也。是其先亡乎!”又如为之歌《魏》,曰:“美哉,泝泝乎!大而婉,险而易行,以德辅此,则明主也。”<sup>[1]2006</sup>这种评论视角带来了早期音乐评论的重要论题:关于“乐与政通”的讨论。后来的文献《礼记·乐

收稿日期:2013-01-15

作者简介:陈绪平(1980—),男,山东单县人,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。

记》、《毛诗序》对此做了更为系统的承续。

从上述资料可知,孔子之前的诗学,或讨论诗的音乐风格,或从音乐性出发讨论该种音乐风尚的社会意义,也就是经由音乐观察社会政治,即产生了“乐与政通”的诗学观念。

## 二 孔子诗学略说

评介孔子的诗学,无疑是件困难的事情,一则源于孔子卓著而繁富的文化贡献;一则源于先秦记录手段的不足,造成的文献不足征。然而历史总是会零星地保留下来最重要的文化记录,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(下文简称《汉志》)的一句话,就可以说是对孔子及其时代知识分子文化活动的集中表达,曰:“昔孔子没而微言绝,七十子表而大义乖。”<sup>[5]1701</sup>这里运用了互文的修辞格,其意义就是说,孔子及其门徒注意阐发经典的“微言大义”。“微言”又见《汉志》,曰:“以微言相感,当揖让之时,必称《诗》以谕其志,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。故孔子曰‘不学《诗》,无以言’也。”<sup>[5]1755</sup>这里的“微言”,代表的是春秋时期的外交仪式中,使用“赋诗言志”的方式,表达自己的主张。

在这里,我们发现孔子诗学的学理背景,是在交际“赋诗言志”、谈话“引诗”等时代风尚推动下开展起来的。在这一背景下,人们建立了《诗》与外交、日常生活的联系,其诗学的观察视角转移到《诗》之“微言大义”,这是孔门诗学活动的高度概括。

关于先秦典籍引诗、赋诗、歌诗等资料,董治安先生做过全面的研究,文献考订工作的成果,可参《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》<sup>[6]</sup>一书。毛振华先生《左传赋诗研究》又做了更为细致的工作,分国分时期研究了“赋诗言志”这一文化现象,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生活的时代《诗》在政治外交诸活动中的重要作用<sup>[7]</sup>。这构成了孔子诗学的学理背景,前贤论之详矣,今不赘述。

作为记载孔子思想的重要典籍的《论语》较为全面的记述了孔子的诗学评论,今逐条罗列如下,以更明确地揭示孔子诗学的特征:

(1)子曰:“《诗三百》,一言以蔽之,曰:思无邪。”<sup>[8]《为政》,39</sup>

(2)子曰:“兴于《诗》,立于礼,成于乐。”<sup>[8]《泰伯》,298</sup>

(3)子曰:“吾自卫返鲁,然后乐正,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。”<sup>[8]《子罕》,345</sup>

(4)子曰:“诵《诗三百》,授之以政,不达。使于四方,不能专对。虽多,亦奚以为?”<sup>[8]《子路》,525</sup>

(5)鲤趋而过庭。曰:“学《诗》乎?”对曰:“未

也。”“不学《诗》,无以言。”鲤退而学诗。<sup>[8]《季氏》,668</sup>

(6)子曰:“小子何莫学乎《诗》?《诗》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。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,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<sup>[8]《阳货》,689</sup>

(7)子谓伯鱼曰:“女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矣乎?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,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?”<sup>[8]《阳货》,690</sup>

以上七条资料记录了孔子诗学的基本精神。由第一、二条可知,《诗》是孔子教育教化的重要内容,他强调《诗》对人道德修养的意义。“思无邪”、“兴于《诗》”的表述证明,孔子强调学《诗》要关注乐辞所蕴含的道德蕴旨,并以此来规范个人行为,以达到“成人”的目标。由第三条可知,孔子晚年对《诗》文本做过文献整理工作,进行过《雅》、《颂》音乐方面的整理、纠正等工作,这和孔子的删诗相联系。由于史料不足征,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分歧较大。我们认同孔子删诗说。

第四至七条材料,则清晰地告诉我们,孔子诗学,特别是孔子诗教的目的是培养人“使于四方”的“专对”能力。与之相对应的是春秋时代邦国外交中流行的“赋诗言志”活动。正因为赋《诗》、引《诗》实践的繁富,正因为现实社会对赋诗的迫切要求,才有孔子“不学《诗》,无以言”的诗学思想,换一句话说,外交与政治需要构成了孔子诗学的生成背景。

孔子及门人引用《诗》和篇目以论事,尚有《学而》引《卫风·淇澳》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”<sup>[8]33</sup>;《八佾》引《卫风·硕人》中“巧笑倩兮”<sup>[8]89</sup>;孔子评《关雎》“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”<sup>[8]116</sup>;《泰伯》中引《小雅·小旻》的“战战兢兢,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”<sup>[8]291</sup>;《泰伯》载孔子评论曰“师挚之始,《关雎》之乱,洋洋乎盈耳哉”<sup>[8]305</sup>;《先进》中“南容三复白圭,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”<sup>[8]444</sup>。今按:白圭即《大雅·抑》之篇。以上六条资料,虽然只是部分内容涉及到《诗》,孔子也是借题发挥,阐发《诗》的“微言大义”,或用于私学教育,或用于外交礼仪。其中有讨论音乐的两则评论,即《关雎》之“哀乐”和“师挚之始,《关雎》之乱”<sup>[2]287</sup>,则是通过对这两首诗演奏情形进行描述,以达到诗教的目的。

上海博物馆新近发行的战国楚竹书,有被称为《孔子诗论》的资料,尽管学界对这些材料的属性、作者、年代诸问题仍有诸多争论,然仅就文本看来,可以说,它的诗学视角已经转移到诗之义上了。它仅用一字,或者几字,评论诗之引申义。比如,第十简是一组对风诗的讨论:“《关雎》之改……《燕燕》之情。”<sup>②</sup>

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见出:孔子对《诗》的尊崇程

度,以及他利用《诗》的经典力量以表达己意的诗学思想的方法。正是以“赋诗言志”为代表的用《诗》实践,正是孔子兴办私学的实践,这个背景使得孔子《诗》学实现了文化转向<sup>⑧</sup>,从早期的乐教、声教,即针对瞽矇、国子的音乐教育,转向《诗》教,即针对大众的道德修养的教育。前者注意诗之声乐,后者注重诗之语义。

以董治安《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》关于先秦赋诗、引诗的统计,来考察一下孔门之后的诗学状况,从中我们会对孔子诗学文化转向的意义获得充分的认识。孟子提出了“以意逆志”的诗学主张;荀子“隆礼劝学”,引诗、讨论诗都是为了运用《诗》来彰显自己的思想主张。经由孟、荀,这种诗学承续到有汉一代,形成了以推演诗义为特征的发挥《诗》的现实功用的今文经学<sup>[9]</sup>,早期歌《诗》、舞《诗》等音乐活动不再流行。以孔子为分水岭,引用《诗》、借助《诗》之经典意义来为自己的思想奠基,阐释《诗》之“微言大义”来为我所用,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学说与主张,逐渐成为了诗学主流。

周秦时期繁复的赋《诗》、引《诗》、评《诗》实践带来了诗学理论的突破,孔子是这一突破性变化的节点人物,即孔子诗学实现了从音乐礼仪之诗乐,转向到文化层面上的“诗言”之诗,开始运用《诗》进行教学、教训及表达自己的看法等。

在《韩诗外传研究》中,我们深入分析了汉代诗学的特色,所有认识都基于对《韩诗外传》的文本细读,我们在研究中实现了汉代经学与先秦子学的勾连,揭示了汉代初期经学草创时期经典注疏史的特点,即注重推演经典的微言大义,是面向人的说解。当我们将汉代的经学实践同孔子时代的诗学相联系,我们可以更好地见出孔子诗学文化转向的意义。

### 三 孔子诗学文化转向的意义

《通志》曰:“汉立齐、鲁、韩、毛四家博士,各以义言诗,遂使声歌之道日微。”<sup>[10]</sup>其实,“以义言诗”,当从孔子算起,而且这正是孔子诗学文化转向的最为重要的特征。即我们看到孔子诗学,注意在“辞”义层面运用《诗》,以服务当下政治和日常生活。这就和过去的诗学视角发生了根本变化,即先秦诗学从注重对礼“乐”的评论、关注,转向到对注意其乐“辞”的研读和运用。

之所以说是文化转向,因为它意味着诗学传承方式的变化。在孔子这里,《诗》是作为教材,使用在平民、贵族的教育教学过程中,他面向的对象或是有志于学的平民、贵族子弟,或是常常出现在外交场合的大臣、行人、君王等。在教育教学的时候,《诗》作为教材;在外交言谈的时候,《诗》作为外交辞令,以表达自己的

政治主张和诉求。可以说,此时的诗学评论的发生无论是应用场合,还是评用《诗》的目的,都迥异于孔子之前的时代<sup>⑨</sup>。

之所以说是文化转向,因为它还意味着一种文化承担者的转移,即前一阶段是以巫为主的《诗》的传承者,变成了以“士”为代表的《诗》的使用者。前者以歌诗、舞诗、颂诗等主要诗学活动为主;后者以诵诗、赋诗、弦诗等主要方式使用《诗》,阐发《诗》之微言大义。

了解了这些,我们就会对《孟子》“《诗》亡而后《春秋》作”<sup>[11]</sup><sup>572</sup>有更为深刻的认识。孟子的话,即可作为对这一文化转向的深刻总结,它揭示了巫文化向史文化的过渡,这个过渡也意味着早期文献记述内容从以记言(口传)为主发展成以记事(书写)为主。从文化史的角度观察,早期的《诗》,是祭祀诸仪式中作为颂歌而存在的族群史诗,以《诗》中的“颂”最为典型,而“《诗》亡而后《春秋》作”表达的《春秋》之史,是史官书写记录的历史,两者的本质不同在于文化形态的变化以及文化传承方式的变化。

### 四 结论和余论

如何认识孔子诗学的文化转变,关系到我们如何认识《诗》到《诗经》的演变。关于《诗》的早期形态研究都指明:《诗》是作为王官之学而存在的,它的生存条件是早期文明的礼乐文化建设的需要。它的构成有三部分,即神职人员用以祭祀诸仪式的颂歌、贵族宴饮诸场合的雅诗以及采自民间的风诗。而当历史来到春秋时代,礼坏乐崩、官学下移,在“处士横议”带来的“赋诗言志”风尚的推动下,《诗》作为通行语言,成为行人表达政治立场的外交辞令;作为知识,成为私学教育的教材;作为上古存留下来的经典,成为指导日常人生的法则和思想依据。于是,“诗曰”成为知识分子阐述经典思想的引文格式,于先秦典籍中屡见不鲜,当然与“诗曰”相联系的还有“子云”。可以说“子曰诗云”成为一个范式深入在传统学术里,成为中国学术的一大特色。

历史来到有汉一代,《诗》被奉为经典,《诗经》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。中央有三家诗学,地方有楚元王诗、河间献王诗等刘姓藩国诗学。为了统一经义,服务国家政治,汉代统治者通过立“博士”、置“经师”等方式来规范经典的传承,而熹平石经的出现,可谓是为解决多家经学争端而做出的国家行为。它意味着汉代有了标准的五经教材,即以“熹平石经”为本。联系石渠、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,可以看出汉代以国家为策动力的经学传承,也正是在国家力量的策动下,我们从《汉志》、《儒林传》中可以看到汉代诗学成果的繁

富。前者著录了三家诗学的著述,后者叙述了三家诗学的传承和故事。在国家学术体系中,《诗》的传承者是经师博士以及博士员。

可以说,从学术史角度观察,汉代完成了《诗》到《诗经》的过渡。早期的应用于礼乐制度的《诗》,最终转化成六经学术之下的《诗经》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可以见出“子曰诗云”的重要意义,即孔子诗学文化转向的意义。这就是孔子诗学的文化贡献:音乐礼仪之《诗》,转向到经学之《诗经》。而影响中国传统学术千年之久的经学传统,正是在这个转向中,由孔子及其贤

弟子奠基的。如果把眼光放开点,我们不妨说,《诗经》学史可以分为四部分:作为音乐礼仪的《诗》(通过巫师传承)、作为教育教材的《诗》(通过“士”传授)、作为六经学术的《诗经》(通过经师、博士传承)及现代学术勃兴之后的作为文学的《诗》。而孔子是实现《诗》到《诗经》转向的关键人物,与之联系的学理背景是礼坏乐崩之下的私学兴起和“赋诗言志”风尚的推动。孔子开启了“以义言诗”的时代,实现了先秦诗学从注重音乐到关注乐辞的文化转向,是《诗》到《诗经》学术嬗变中的重要一环。

#### 注释:

①参见:王小盾《诗六义原始》,载《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》,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。

②上海博物馆藏被整理者名为《孔子诗论》的资料,其中的诗学评论或在讨论《诗》与人的修养的联系,或在讨论《诗》与政治教化的关联,这里略举此例,详情可参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。

③当然在今存文献中,尚有一些资料证实孔子对音乐的喜爱和批评,如:“然后乐正”、“皆弦歌之”、“师挚之始,关雎之乱”等。所以我们才说孔子开启了“关注诗之语义”的时代,联系孟、荀后儒,他们讨论《诗》,几乎全部都在论诗之义了。

④关于孔子之前的诗学研究,可参:王小盾《诗六义原始》、马银琴《两周诗史》(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)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阮元.十三经注疏[G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- [2]王小盾.诗六义原始[M]//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.北京:东方出版社,1998.
- [3]王小盾.论汉文化的“诗言志,歌永言”传统[J].文学评论,2009,(2).
- [4]王小盾.论汉文化的“诗言志,歌永言”传统[C]//起源与传承——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论集.南京:凤凰出版社,2010.
- [5]班固.汉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- [6]董治安.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[M].济南:齐鲁书社,1994.
- [7]毛振华.左传赋诗研究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1.
- [8]刘宝楠.论语正义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0.
- [9]陈绪平.韩诗外传研究[D].成都:四川师范大学,2010.
- [10]郑樵.通志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7.
- [11]焦循.孟子正义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7.

## On the Cultural Turn of Confucian Poetics

CHEN Xu-ping

(College of Liberal Arts,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, Chengdu, Sichuan 610066, China)

**Abstract:** Confucius began an era of interpreting poems from their meanings. Since Confucius, the nature of poetry and its inheritance had changed a lot and greatly influenced the later poetics. Confucius changed *Shi* into *Shijing*. “Ziyue shiyun” in early literature reveal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ultural turn of Confucian poetics.

**Key words:** Confucius; poetics; cultural turn; “zi yue shi yun”

[责任编辑:唐 普]